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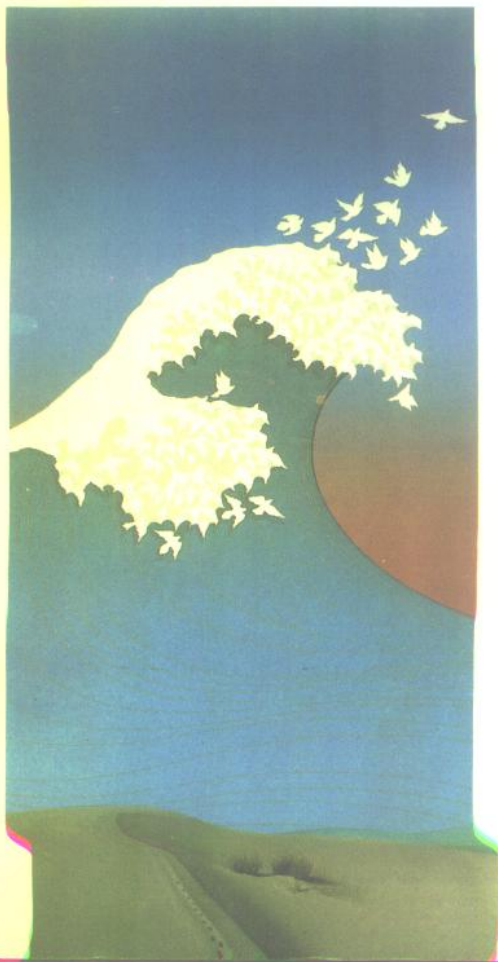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走向21

世纪的人与 哲学

寻求新的人性

〔日〕池田大作 〔德〕狄尔鲍拉夫 著



新登字(京)159号

走向 21 世纪的人与哲学

——寻求新的人性

〔日〕池田大作 〔德〕狄尔鲍拉夫 著

宋成有、李国良、刘文柱、张力 译

贾惠萱 宋成有 校

责任编辑：张文定 汪又红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625 印张 228 千字

1992 年 9 月第一版 1992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301-01969-6/B·0114

(平)定价：5.90 元



池田大作先生与狄尔鲍拉夫对谈的情景

池田大作(Ikeda Daisaku)

1928年1月2日生于东京。现任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SGI)会长。曾获联合国“国际和平奖”、“桂冠诗人”称号。著有《人的革命》(10卷)、《展望21世纪》(与A·汤因比的对话)、《和平、人生与哲学》(与亨利·A·基辛格的对话)、《我的人学》(此书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等许多作品。

约瑟夫·狄尔鲍拉夫(Josef Derbolov)

1912年生于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德国语言学、文学、古典文献学、哲学、教育学、心理学”。1955年任波恩大学哲学及教育学教授,成为联邦德国教育界的教育哲学研究的核心人物。任美国、前苏联、日本等国大学的客座教授。著有大量专著、论文。1987年去世。

中文版序言

21 世纪正在临近……

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我们将把什么样的遗产留给下一代？

寻求和平、环境保护问题、教育问题、生命伦理以及政治、宗教、家庭状况等问题，真是千头万绪。无论提出哪一个问题来，借以说明我们现在正处于探求新秩序的重大转折时期，都绝非言过其实。

为使将要到来的世纪成为人性之光熠熠生辉的“人的世纪”、“生命的世纪”，我们应当去寻求什么？最重要的究竟是什么？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激流中，今天需要我们把真挚的目光投向那静谧无声却奔泻不息的潜流深处。

当此之时，在我面前闪现出照亮我们前进之路的一片巨大光明，那就是贯通中国历史的“中庸”精神。

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里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若将表现在喜怒哀乐之前的不偏不倚的心的中正、心的平正称之为“中”，那么在这里，想要束缚人及其行动的不正情念则无隙可入。于是，便能不间断地、冷静地回归于

“人”，感受到植根于每个人心灵深处的返朴归真的“人本主义”的跃动。

进而言之，所谓“中庸”，与单纯的中间、中立、妥协等肤浅的解释不属于同一层次。这种思想以人的内在变革为第一义，显著地带有人格主义的特征。

佛法所说的“中道”思想，也富有这样的志向性。

总之，一切都通过“人”的道路进行，通过“人”的实践验证其正确与否，这博大的人本主义终将成为滋润新世纪的大河。

这部《走向 21 世纪的人与哲学》，如其副标题所示，汇集了“寻求新的人性”过程中，我与德国教育哲学家狄尔鲍拉夫博士的对谈。在内容上，虽然涉及的是日本和德国的具体事物，但我们对于各个问题都力图鞭辟入里，作出根本的、普遍的阐述。本书若能对中国的读者们有所启示，我将感到无比愉快。

最后，谨向付出翻译、出版之劳的贾蕙萱、许耀明、宋成有、张力、李国良、刘文柱等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

池田大作

1992 年 3 月 18 日

(洲崎周一 译)

日文版序言

我与狄尔鲍拉夫教授曾在日本和德国见过面，商定采用与此前相同的对话方式，即已发表过的《汤因比与池田对话》、《尤伊古与池田对话》、《贝恰与池田对话》、《威尔逊与池田对话》的方式，为架设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展开对话。1982年11月我们在东京的会面，使上述想法变成现实，并确定了对话的主题。

整个对话的脉络由下述章节构成：先从“日德两国的历史关系”谈起，由此逐渐进入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传统生活的现代化”，其次是“西方与东方的人道主义”，再其次是“伦理与宗教的作用”，而“佛教与基督教”问题，则是对谈的高潮。最后，将多角度地分析现代危机状况，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而在末章之前则专设一章，以思考人类未来为前提，研讨“教育”问题。

为加强相互理解，最初的对谈结束后，双方不再以口头方式，而是采用书面形式继续进行对谈。此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言人，日本方面的对谈者池田担任各章主题及由此派生的各种问题的解说；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言人，德国方面的对谈者狄尔鲍拉夫负责系统说明、阐述主题。至于每次对谈遗留下来的问题，双方将再次加以共同探讨，以大致得出结论。对于我们作者来说，最关心的是明

确论议中心。但由于探讨的问题过多,涉及范围相当广泛且十分复杂,因此,或许读者未必容易理解。

我们都不是宏观研究东、西方文化圈的专家,而且各方面的见解也并非完全一致。不过,双方有共同的、十分广阔的思想基础,因此我们认为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本书讨论的各种问题,不仅是大家深感兴趣的,而且是时代要求迫切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确信而且希望能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微薄的贡献。

本书的书名最初定为《寻求新的人性》,听起来也许会使人感到有些大言不惭,却至少表明了我们提出的问题的方向。显而易见,书名仿用了马尔塞斯·普鲁斯特^①的名著《寻求失去的时代》,但探求的方向不同。也就是说,我们的主题不是以往那些值得追忆的事件,而是今后将落在我们肩上而且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然而,除若干结论外,整个谈话几乎没有围绕“新的人性”展开,这也许会使人大大惑不解。其理由十分简单:即单纯作为应加以“寻求”的人性问题,即使能进行综合、研究,却不能直接就事论事。在关于人道主义一章中所谈到的人性问题,也并非是人性的新形态,而是已部分陈腐不堪的各种古老形态。至于人性的未来,当然依旧朦胧不清。目前面临着下述问题,即我们的全新技术政策置世界于进化的压力之下,我们生存条件的改善,迅猛发展的高速度以及随之俱来的怀疑等。因此,不消说下个世纪,就是以后 50 年,不,甚至对未来 10 年,也无法作出令人足以信赖的预见。

许多人立志于未来学,但面对现实中的急剧发展变化,未来学的学者们也惊异不已。在我们对谈的状况分析中,只能尽量做出部分促人警觉的结论。但我认为,即使未得出结论,也应该谈到下述事态:即今天我们正经历着人类的进步导致人类走向灭亡的第一次体验。人类技术过剩的结果足以轻而易举地毁灭自身生存的基础。对生物学家来说,自然界物种的灭绝已司空见惯;对我们这个天体以外的假设的观察者来说,或许会对“聪明的人类”的种族没落与自我灭亡感到惊奇。

不言自明,如果人类想要面对未来并继续生存下去,那就必须在行将结束的 20 世纪,针对日趋严重的各种问题找到一种解决办法。如同我们作者所相信的那样,答案只能通过确定尚属未知的“新的人性”而取得。因此,我们未选用“发展中的新的人性”或“正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新的人性”等提法,反而求助于“寻求”一词所包含的辩证法。辩证法最初由柏拉图^②发现,后来被奥古斯丁^③转而运用于向上帝求道。在这个意义上,在东方的传统中,辩证法作为“寻求菩提(悟道)的人”、即作为菩萨而存在。达到“顿悟”的人,称作“佛”,《法华经》揭示了到达悟佛境界的途径。

求道者虽知其所求之道尚不存在,但他却懂得本来是在追求何物。也就是说,至少他应该首先领会根本倾向是什么。因此,奥古斯丁认为自己与寻求中的上帝的关系是:“如果我未发现你,就不会去寻找你。”在佛教中,日莲大圣人说:“故末法之世的凡夫生若信奉《法华经》,则能

在人界充分具备佛界之悟”。我们已推测出要求解答者为何物,或者至少能在形式上描述其大致轮廓。

我认为,唯有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强烈的责任感和坚强的自制力,才能把握住留待将来接受的事物。的确,我们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去创造未来,但有时也草率地放任自流。自身造成的后果,大都作为难以改变的既成事实反作用于我们,它恰好是在事态进展不顺利时,给我们的未来打上宿命论的烙印。这种“新的人性”的形态以某种精神革命为前提。这一革命意味着摈弃利己主义、商业主义和意识形态支配下的表面行动规范,同时意味着精神方面的急剧变迁,它针对东西方文化传统与以佛教和基督教为核心的宗教的正当的深层要求,使我们得到解放。在解释本书的题目时,希望读者能经常想到这些。

最后,谨向为对谈的进行和翻译全力以赴的理查德·盖吉、艾尔凯·努尔奴特博士、桐村泰次、松户行雄诸君表示衷心感谢。

池田大作

J·狄尔鲍拉夫

1987 年 6 月

补 记

在对谈结束、书稿处于最后整理的阶段,1987 年 7 月 14 日,突然接到了狄尔鲍拉夫教授逝世的讣告。

在一个月之前,教授因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住进了波恩医院。但即使卧病在床,他也仍一直在审订对谈集的书稿,日夜操劳不息。后来,教授的女儿艾尔凯·雅尔努特博士终于酌定并完成书稿。1988年3月由宁芬巴伐出版社(Nymphenburger)出版,德文版的书名是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neuen Humanität*。

现在,英文版的 *Search for a New Humanity* 与日文版同时付梓。我相信,这是对已故狄尔鲍拉夫教授最好的纪念,他会因此而含笑九泉。另外,日文版改用了与该对谈主题相关的书名,即《走向21世纪的人与哲学》。

在此,衷心祝愿狄尔鲍拉夫教授冥福。

池田大作

1988年9月

注 释

- ① 马尔塞斯·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
- ②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
- ③ 奥古斯丁(354—430),早期基督教会领导人,神学家、哲学家。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1)
日文版序言	(1)
第一章 日德两国的历史关系	(1)
1 日德两国的共同点	(1)
2 劳动的伦理	(8)
3 教育与科学	(15)
4 德意志帝国与日本	(19)
5 魏玛共和国体制的崩溃	(24)
6 分裂与统一	(29)
第二章 传统生活的现代化	(36)
1 对现代化的反动	(36)
2 日本应该做些什么	(43)
3 保护自然	(48)
4 家族制度的崩溃	(52)
5 地域共同体的复兴	(62)
6 应付“压力”	(66)
第三章 西方与东方的人道主义	(72)
1 西欧人道主义的背景	(72)

2	重视知识与尊重生命	(81)
3	人道主义的本质与形态	(86)
4	人的善恶两面性	(98)
5	生命世界的协调	(103)
6	“作为人”应具备的条件	(110)
第四章	伦理与宗教的作用	(117)
1	伦理规范的源流	(117)
2	伦理行动的基础	(122)
3	感情的压抑与升华	(127)
4	儿童教育	(131)
5	伦理与政治家	(138)
6	医生与伦理性	(145)
	(1)安乐死问题	(147)
	(2)关于临床死亡	(149)
	(3)关于人工流产	(150)
第五章	佛教与基督教	(153)
1	佛教与基督教的相同之处	(153)
2	爱与慈悲	(162)
3	佛教是否对基督教有过影响	(170)
4	是佛法还是人格化的上帝	(179)
5	德国人与佛教研究	(204)
6	佛教和基督教的交流	(216)
第六章	教育问题	(226)
1	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226)
2	教育与政治权力	(238)
3	拒绝上学的原因	(250)
4	校内暴力风潮	(256)

5 青少年的犯罪行为	(264)
6 童话与性格的形成	(271)
第七章 现在要为了未来.....	(283)
1 对环境的破坏——横遭掠夺的地球	(283)
2 各种各样的污染物	(293)
3 危险的玩火游戏	(309)
4 保存文化遗产	(319)
5 生命工程学课题	(328)
译者后记.....	(355)

第一章 日德两国的历史关系

1. 日德两国的共同点

池田：回顾过去的历史，日本和德国在许多方面有过共同的经历。因此，我认为：就研究所谓“现代化”所带来的弊端而言，考察两国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有重大意义。

就日本与德国的交流史而言，时间不算久远；但对近代日本的形成给与最大影响的国家，却是德国。

在日本历史进程中，若概述它从哪些国家，接受了哪些影响的话，我想：在史前时代，恐怕是接受南太平洋各民族的影响，从而奠定了日本民族的基础。在古代，影响当然来自朝鲜半岛诸国和中国。从衣食住等基本文化到文字、宗教、道德观，从城市布局到国家机构，在进入古代以来的一千几百年，日本不断地向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各国学习，奠定了日本文明的基础。

自16世纪首批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来到日本后，欧洲文明的影响才波及日本。他们带来了称之为“迪雅曼”的玻璃器皿、火绳枪、烟草等嗜好品，还有南瓜等食用植物以及点心等。天主教信仰也进入了日本。但是，到德川时代，由于幕府采取锁国政策，只允许与中国和荷兰通

商,外贸港口仅限于长崎一地。

至德川时代末期(1853 年 6 月),美国派遣培理提督^①来日本,在其强硬要求下,日本被迫打开国门。其后,随着国内分裂、对抗的激化,一派势力与英国相联合,另一派势力则投靠法国。对抗双方凭借手中的现代武器,互竞雄长。结果,德川幕府还政于朝廷,1868 年建立起以天皇为核心的国家体制,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明治政府在建立足以与欧美列强对抗的现代国家时,围绕以哪个国为模式的问题,进行了各种探讨。1871 年,日本决定以刚刚成立的普鲁士为盟主的德意志帝国为效仿的典范。

明治政府的实权派伊藤博文(1841—1909)曾亲自赴德国,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以德意志帝国宪法为范本,在 1889 年制定了宪法。勿庸赘言,从议会、内阁、司法机关、官僚机构到教育机构,全都效仿当时的德国。司法、医学等各门学问,也皆以德国为师。明治、大正以至昭和初期,官费留学生几乎都是赴德国留学。

狄尔鲍拉夫: 的确,日本向国际社会敞开国门时,与德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时,日本从德国输入大量的文物制度,如宪法的范本、近代军队组织和警察机构等。日本的大学招聘德国的大学教师,德国的建筑师亲自设计东京的主要公共建筑。

在回顾历史过程的同时,若划分出西方关注日本的几个时期来观察,我想会更加明了日德两国的关系。

在 15、16 世纪,中欧与日本的关系主要以第三国为中间媒介。当时,尤其是在欧洲王公贵族阶级中间,多把中国和日本看成是装饰城堡厅馆并使之具有异国情调的一种“骨董陈列室”。其后不久,通过旅游热和对未知之国的兴趣,架起了第二座桥梁。这期间,远东的中国和日本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从那时的游记来看,一部分属于传闻式的记述,另一部分则产生于史书式的记载,是极其认真地加以领会后的记述。传闻式的描写大都带有文明批判的倾向,例如阿尔江侯爵^②和奥里夫·哥尔德斯密斯^③的《中国人信札》(也译作《世界公民》——译者注),使人想起孟德斯鸠^④的著作《波斯人信札》。《中国人信札》以一个在欧洲旅行的中国人的口吻,指责欧洲存在的种种弊端,并依据当时启蒙主义的观念,把远东描写得十分理想化。中国和日本成了令欧洲人自叹弗如的国度。或者有时竟从反方向描述欧洲弊病,以构成鲜明的对照。

恩格尔白尔特·肯白尔^⑤在最早问世的《江户见闻记》中,嘲笑荷兰人谒见将军的场面如同“耍猴”表演。正如您所说,信奉新教的荷兰人在长崎设立了商馆。那是以屈辱让步为代价,从而获得了幕府当局设馆的允许。日本的天主教信徒为维护其信仰,在 1637—1638 年举行起义,即“岛原之乱”,但以惨败而告终。

在最早一批有过赴日经历的人当中,有个名声不佳的毛里茨·比奥尼奥夫斯基男爵^⑥。他自称起初曾担任过玛利亚·苔来姬阿女王^⑦的公使,后来得知自己是波